



史记讲论

邹文贵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史记讲论

邹文贵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讲论/邹文贵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4

ISBN 7 - 207 - 06958 - 8

I. 史... II. 邹... III. ①史记—研究②司马迁
(约前 145 或前 135 ~) —人物研究 IV. ①K204. 2②
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3588 号

责任编辑:姜海霞

封面设计:李梅

史记讲论

邹文贵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hs@yeah. net

印 刷 佳木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07 - 06958 - 8/K · 795

定价: 16.5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上编 讲论

- 一 司马迁的家世、生平与时代 (3)
- 二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13)
- 三 司马迁的历史观念 (24)
- 四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37)
- 五 司马迁的军事思想 (47)
- 六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 (57)
- 七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67)
- 八 《伯夷列传》赏读 (76)
- 九 《游侠列传》赏读 (83)
- 十 《史记》的叙事艺术 (91)
- 十一 《吕太后本纪》赏读 (104)
- 十二 《魏其武安侯列传》赏读 (111)
- 十三 司马迁的写人艺术 (119)
- 十四 《项羽本纪》赏读 (130)
- 十五 《李斯列传》赏读 (138)
- 十六 《史记》的语言艺术 (146)

下编 注释

- 一 太史公自序(节选) (161)



二	伯夷列传	(173)
三	游侠列传	(177)
四	吕太后本纪	(184)
五	魏其武安侯列传	(197)
六	项羽本纪	(211)
七	李斯列传	(237)
后 记		(257)

上 编 讲 论



一 司马迁的家世、生平与时代

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都有极高的地位。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既简要又精辟。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比较西汉文章两司马时说:“司马迁的著作却是另一方面的,他的成就也是另一方面的。他不誇耀他的绝代的才华,他低首在那里工作。他排比,他整理古代的一切杂乱无章的史料,而使之就范于他的一个囊括一切前代知识及文化的一个创作的定型中。而他又能运之以舒卷自如、丰泽精刻的文笔。他的空前的大著《太史公书》(即《史记》)不仅仅是一部整理古代文化的学术的要籍、历史的巨著,而且成了文学的名著。”郑振铎先生也是从史学与文学两个方面来概括、总结《史记》成就的,只不过他的概括是着眼于《史记》的内容、框架与司马迁的表述文采而已。对于《史记》这种思想与文采俱佳、史学与文学兼善的文化经典,我们要想走近它,理解它,就必须遵循知人论世的解读策略,系统地梳理一下他的家世、生平与时代,并以此为阶梯,登堂入室,探奥赏美,“尚友古人”。

家世与《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开篇伊始,即自述家世:

昔在颛顼,命南王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



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在这种探本穷源式的有关家世谱系的陈述中，司马迁告诉我们，从远古到现在，史官职守一直是其族姓家门主要的世官祖业。虽然其中有为时不等的两次中断，但都断而复续，失而复得。以史为职，这种世官祖业对于司马谈、司马迁显然具有巨大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它直接决定了谈、迁父子对于职业的选择与趋就。我们知道，古代社会重血缘、重家风、重传统，司马谈之所以对史官之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之所以对史官之职怀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和挥之不去的情结，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以史为职是其世官祖业。为了胜任史职，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并且跃跃欲试于史书的撰述。他安排司马迁远行游历，登临访古，目的就是司马迁作定向培养，让司马迁将来能够继世修史，子承父业。他在临终遗嘱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这件事情。他说：“自前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



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谈职官选择的指导思想就是兴废继绝、赓续祖业，光大祖业。正是司马谈这种刻骨铭心的情结，才促使司马迁子承父志，成为名扬百世的赫赫史官。当然，世官祖业对司马迁的影响并不止此一端。史官的传统职守也影响到了《史记》一书的写作目的与内容构成。一般说来，先秦时期的史官职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司天”，“掌天官”，也就是观察、推测天文星象的分布、运行及其与人间事物的神秘联系等；二是“记言”，“记事”，撰成史册。到了汉代前期，史官仍然要承担这两项职责。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史官的职守概括为“文史星历”四个字，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究天人之际”竟是《史记》写作的三大目的之一，为什么司马迁《史记》“八书”中还要包括夹杂着神秘色彩的同时又非常专业的《天官书》与《历书》。

家世之中，史官之外，司马迁先后推出三位武将。第一位武将程伯休甫，曾经留名于《诗经》之中。《大雅·常武》中写道：“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阵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西周宣王时，国力有所恢复，北击匈奴，南击荆楚，东击淮夷。看来，程伯休甫即是东征淮夷的主将。文职变而为武职，从此，司马氏家族就以司马为姓。程伯之后，司马家族中又先后出现两个重要的军事人才，一个是司马错，一个是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司马错与张仪同时，是秦惠王的重要将领。在秦国的发展及用兵方向上，司马错曾与张仪有过争论。张仪主张伐韩伐周，司马错则主张伐蜀以富国强兵、广地富民。最后，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并命之为帅，举兵伐蜀，从而开疆拓宇，奠定了秦国雄视东方六国的原始基业。司马错之孙司马靳是司马迁的六世祖，是秦将白起的得力助手。白起不肯受命兵围邯郸，所以作为副手，司马靳被秦昭



王一道赐死杜邰。司马迁究竟从其作为武将的先祖身上学到了什么,接受了什么,我们不得其详。但是推测而言,先祖的军事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开启司马迁对战事兵法的兴趣、思考与研究。当然,这种开启的深广程度、开启的具体之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因为可以引发司马迁关注军事、关注兵战的可能因素是多元的,而不是惟一的。

三位武将之后,家世之中,相继出现的是两位从事经济活动的先辈。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秦始皇时做过主铁官,三世祖司马无泽做过汉代管理长安集市的市长。有关司马昌、司马无泽的详情不得而知,但陈力就列,身在其中,必然具有较为专门的经济知识与管理经验,同时也必然形成不同于一般儒生的经济观点。我们不能肯定家世之中的武将战功对司马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讲,司马昌、司马无泽的经济活动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毫无疑问,儒道两家是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渊源,而司马迁却鼓励致富,宣传求利,他的经济思想显然不是来自于儒家、道家。儒道而外,司马迁对管子的思想有所吸纳,但是仅靠有所吸纳,似乎还不能形成一种根深蒂固并且有体系、有套路的经济思想,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又恰恰具有这样的特点。经过这样的粗略的“排查”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得利于他的“家学”。因为重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重视社会的经济生活,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两篇极有分量的经济类文本,即《平准书》、《货殖列传》。

最后,我们还要就司马谈的影响再补充一点。除了前面提到的引导、要求司马迁走上史学之路,司马谈对司马迁影响较大的是他对道家黄老之学的推崇。司马谈学术思想的代表作是《论六家要旨》,这是汉代学术思想史上极具时代特点的重要文章。文章之中,司马谈对儒、墨、阴阳、名、法、道六家思想均有评价。在司马



谈看来,“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在这里,司马谈对其他五家既讲到优点,又指出不足。惟独对道家赞不绝口,说道家与时俱进,说道家兼采众善,说道家清静寡欲,说道家事半功倍……极尽推崇之能事。司马谈的思想取向就其实质而言体现了汉代前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严格地讲,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消长兴替的角度看,司马迁主要是生活在儒学话语取代黄老之学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种思想文化语境中,司马迁对道家主要是对清静无为之治表示认同、肯定,其中显然留有司马谈思想影响的印痕。

生平与《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二十岁前,主要在家乡耕读,二十岁开始远行游历,二十七岁仕为郎中,三十八岁任太史令,四十九岁为中书令,五十五岁在中书令任上写下了著名的《报任安书》,卒年不详。一生大略与汉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生平之中,有三件事情,必须予以关注。

第一件事情是司马迁的访古游历与扈从巡行。未仕之前的壮游主要是为访古而游历,出仕之后的扈从巡行,司马迁也曾有意识



地考察史迹，自广见闻。

《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封禅书》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

以上的材料，基本上标示出了司马迁仿古游历与扈从巡行的游迹行踪。毫无疑问，《史记》的写作，主要依靠汉王朝石室金匱之中收藏的文献资料，但是司马迁的游历仿古与扈从巡行对《史记》写作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它既关系到《史记》历史材料的丰博信实，也关系到《史记》相关篇目的能否设立，更关系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性格把握以及叙事文笔的生动活泼。换言之，司马迁的游历仿古与扈从巡行对《史记》写作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意义。

第二件事是遭李陵之祸。此事非同小可，应当详细说来。

1. 李陵事件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是由李陵败降一事引起的。李陵是汉之飞将军李广之子。天汉二年（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匈奴，汉武帝召李陵为李广利将辎重，李陵不肯，请求独当一面。反复申请之后，武帝同意让他率领五千士兵从居延出发，北



行以分匈奴兵势。结果这支小部队遇上匈奴的大军,李陵与部下虽英勇奋战,但终于因为没有后援,寡不敌众而失败。李陵被俘,最后投降了匈奴。

2. 司马迁之评 司马迁认为:李陵其人与一般人相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自非碌碌之辈、平庸之人,可谓奇士。就其报国志而言,李陵“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难”,可谓国士。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评论李陵败降一事,自不免多有肯定、理解、同情之辞。譬如,称李陵有名将之风,称李陵功大于过,李陵之降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司马迁自己讲,之所以如此评说李陵还基于两种考虑,即“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报任安书》)。广主上之意就是为汉武帝解烦去忧,塞睚眦之辞则是要驳斥、回应那些朝臣见风使舵,出尔反尔,心无定见,甚至趁机报复的行为。因为“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3. 后果与影响 此评一出,惹来宫刑之祸。“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圜之中,谁可告愬者!……李陵既生降,隳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所谓沮贰师、诬上就是贬低李广利,诽谤皇帝。罪名如此,岂有生理。于是被投入监狱,判以死刑。自己无钱自赎,又无人营救,为了活下去以完成《史记》,无可奈何,只能接受宫刑。这就是所谓的遭李陵之祸。

遭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主要表现在《史记》著述的指导思想与写作动机的变化上。遭李陵之祸之前,司马迁给自己写作《史记》确定的基调是润色鸿业,作盛世颂歌,是



要歌颂明君贤主忠臣死义之士。遭李陵祸事之后,思想感情与写作动机有了巨大的变化。《史记》的写作是要抒情释愤,要成一家之言。当然,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司马迁于世态炎凉、社会黑暗、统治者之残忍的一面有了清醒而又深切的认识。

第三件事是《史记》的写作。《史记》的写作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著述的起迄时间。《史记》开始撰述的时间是前104年,即太初元年。此时司马迁42岁。前91年即征和二年《史记》基本完成,证据是《报任安书》。其中称:“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兴败成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年司马迁55岁。其次是《史记》著述对司马迁的意义。遭受宫刑,司马迁引以为奇耻大辱,《报任安书》中讲,“居则忽忽若有所忘,出则不知其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以说,重辱之下的司马迁已经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李陵之祸后,司马迁之所以能隐忍苟活,可以说《史记》之撰述恰是其生命的全部寄托与精神上的惟一支柱。司马迁自己讲:“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故“叙往事,思来者”,寻求隔世知音,追求精神不朽,这就是《史记》写作之于司马迁生命个体的意义。

时代与《史记》

前面讲过,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建元是汉武帝的一个年号,这里它指代的就是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认为,汉高祖开国之后,经过惠吕“垂拱”、文景之治,到了武帝时期,兴旺发达,已臻盛世。司马迁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这种盛世之征、兴旺之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



理解。

经济上空前繁荣

《平准书》中有一个对比记载,可以令人感性地了解汉武帝时期的富足状况。

高祖之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汉武帝之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汉高祖时的经济凋敝与汉武帝时的经济富足差距甚大,一望而知。

政治上极其强大

汉武帝执政之后,对内采取了一系列的强有力的措施,维护国家权威,加强中央集权。譬如,打击强宗豪族,瓦解黑恶势力。再譬如,铲除割据力量,改定王国制度。这两方面的情况,《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都有记载。

偃(即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迁徙而外,对待强宗豪族还有武力镇压的方式。总之,铲除豪族与削弱王侯双管齐下,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与此同时,汉武帝凭借着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伐匈奴,征闽越,征南越,通西域,通西南夷,设沧海郡,大大地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

文化上呈复兴之势

制度文化方面,“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汉高祖之时,就已着手修复。到了汉武帝,“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渐趋完备。思想文化方面,“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诗》《书》往往间出矣”。诸子之学重新“出场”,各领风骚于不同年代。典籍文献方面,因为汉初废除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所以到了武帝之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此外,审美文化方面应该提及的是铺张扬厉、润色鸿业的散体大赋也应运而生。这一切均表明:文化建设也已呈现全面复兴之势。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国势、全盛的氛围的感召与推动下,谈、迁父子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强烈的职官责任感。司马谈对司马迁遗嘱道:“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自己也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谈、迁父子均认为,生逢盛世,身为史官,也就有责任为国朝添采,为盛世助力,有义务写出一部襄时赞世的史学著作。

当然,汉武帝执政的时间很长,这期间,由于汉武帝实行酷吏政治、多欲政治。征伐不已,巡行不已,祭祀不已,求取不已,杀戮不已,结果直弄得民生凋敝,国库空虚,四海动摇,“盗贼”滋生。社会的各个方面又渐有衰败之象。这种盛而转衰、盛而转弱的王朝走势,也给《史记》的批判锋芒提供了客观的生活基础。